



中

兵

国

学

先秦
卷



中国兵学

先秦卷

谢祥皓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1998年·济南



中 国 兵 学

谢祥皓 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:25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44印张 15插页 930千字

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ISBN 7-209-02312-7

E·1(全三册) 定价:85.00元

卷首题辞(主题词)

人	民
智	慧
和	平

FKBP/27

一部兵学专著，冠以如此显赫的主题，似乎不可理解。然而它决非笔者撰写书稿之前的“构思”，恰恰相反，它是笔者在完成书稿之后，反复萦回于脑际的必然结论。

——历史的主体是人民，兵学（政治与军事）的主体同样是人民。这既是作者完成书稿之后的最深刻的感受，也是作者最急于向读者交流的。——全书为证。

“引经”二则

一、《孟子》

《尽心下》曰：

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

引者试析：

粗阅此言，似孟子以为，“书”之有，反不如无；或曰，无书反胜于有书。

稍察之，则知前解之非。孟子所埋怨者，在于“尽信”，如不“尽信”，自然还是“有书”的好。不然，孟子到哪里去“取二三策”呢！对此语朱熹曾注曰：“《武成》，《周书》篇名，武王伐纣归而记事之书也。策，竹简也。取其二三策之言，其馀不可尽信也。”（见《四书章句集注·孟子集注》卷十四）

查《尚书·周书》，《武成》篇计约三四百字，其究竟用多少竹简，今已难以考知，而孟子所取之“二三策”，大约不过数十字而已，即孟子所取者乃其数分之一也。或曰，依孟子之意，“书”之可信者甚少，而不可信者太多。——纵然如此，若无《周书》存在，孟子的“二三策”又向何处去“取”呢？

细思之，孟子之言亦未必可信也。查孟子所怀疑者在于：既然“仁人无敌于天下”，“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”

(见《孟子·尽心下》)故疑《周书·武成》所称“血流漂杵”失真也。

杵者，舂杵，即古代舂米之大木棒也。血流竟至于使大木棒漂而流动，足见流血之多。孟轲在想：“以至仁伐至不仁”，怎么还需要流这么多血啊？——由此推断，“书不可信”。

——孟轲乃以自己的“理性”，“想当然”而否定《书》之所载也。

孟轲之言可信否？——笔者以为，亦未必然。历代兴师，血流成河者屡有记载，并非尽是随意屠戮，正义之师亦必拼命流血，而后方可胜利成功也。——可见，孟轲之所“不信”者，亦未必“不可信”也。

孟轲之言未必是，笔者之言未必非。至于究竟谁是谁非，谁非谁是，抑或各有所非，各有所是，自当由读者自行裁决。读书，决非单纯“过目”而已，须“过脑”也。若如酒肉佛徒之戏言：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坐”；即使有“激光扫描”之术，何益于人哉！

二、《庄子》

《天道》篇述录“轮扁议书”曰：

世之所贵道者，书也；书不过语，语有贵也。语之所贵者，意也；意有所随，意之所随者，不可以言传也。而世因贵言传书。世虽贵之，我犹不足贵也，为其贵非其贵也。故视而可见者，形与色也；听而可闻者，名与声也。悲夫，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！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，则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而世岂识之哉！

桓公读书于堂上，轮扁斫轮于堂下，释椎凿而上，问桓公曰：“敢问，公之所读者，何言耶？”

公曰：“圣人之言也。”

曰：“圣人在乎？”

公曰：“已死矣。”

曰：“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！”

桓公曰：“寡人读书，轮人安得议乎！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。”

轮扁曰：“臣也以臣之事观之。斫轮，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而不入；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于其间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。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，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！”

这是一则颇有名气的历史或“寓言”故事，问题的核心在于语言能不能表达、传递“意蕴”的精妙之处。

轮扁，名扁，齐桓公之臣下，以善“斫轮”而称“轮扁”。桓公读书，自以为“圣人之言”，俨然神圣不可侵犯，然轮扁竟“释椎凿而上”，径直指斥桓公所读为“古人之糟魄”。“糟魄”，亦作“糟粕”。中国做“酒”之历史甚久，做酒时，“精”而升华者为“酒”，“粗”而下沉者为“滓”，酒滓曰“糟”，粗糟称“粕”。轮扁依自身“斫轮”之体验，认定人之思想、意蕴的“精华”部分，语言不可以表达，故古人思想之精妙之处，早已于其死亡之时带入了坟墓，而存留之语言以及形之于文字的书籍，皆其“糟粕”而已！

夫如是，“读书”尚有何意义！

——那么，轮扁之议，是耶？非耶？

若其是，现存文化典籍尽为糟粕也，于今人有何裨益？

若其非，则在既存典籍中，其“精髓”“要妙”可径直立取也，何须精思细研，细细体悟？

折衷曰：轮扁之议，亦是，亦非。

唯其是，故今人决不可径直套用古籍。既为糟粕，何可即用？

唯其非，故今人可向旧典中索求精髓要妙。唯其既有，故可索求。

积粪土为沃壤，化腐臭为神奇。——精于读书者，奥妙正在于此。若弃而不用，纵置身于宝库之中，何异于垃圾粪土环绕其身！

此次《中国兵学》之作，洋洋上百万言。然究其实，绝大部分为中国古代典籍的摘抄或转述，作者自身的思索与慨叹，不过如“粘合剂”而已，乃取旧典之资料以塑之为一个“整体”也。作者虽自认为尽取古史之精华，然依轮扁之议，或抑“集糟粕之大成”也。

和氏获璞，视若至宝，不惜刖双足以护之。他人视之，其迂愚竟至于斯！“糟粕”也罢，“精华”也罢，能聚沙成塔、化土为金者，唯诚者行之！——舟行于水，车驰于陆，各得其便，各行其是。

孟、庄二君，均为古之大家，姑录上语，以为“前奏”。

致 读 者

读者是作品的生命所在,若没有读者,即使出版社慨然相允,予以印制,结果也只能是死书压库,印而不行。因此,作为本书的撰著人,自预立选题,设计构思,以及整个撰写过程,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读者。

作者与读者,作为同一个时代的人群,特别是作为同一个“文化圈”、同一国度的人群,其所思所虑,所欲所求,所喜所好,所爱所恨,虽或因各种人文因素的差异,可能会有千差万别,然而,作为人性之大端,必多有共性存焉。人生世事,各行各业,或情变千种,或形隔万里,然只要心之所系,情之所钟,共在于斯,实乃“心心相印”者也。语云:同声相应,同气相投。又云: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大凡同此一心,共此一情,其好恶必有共也。笔者撰写此书,无异于在浩瀚的书海里搏击,在历史之长河中漫游,笔者之矢志所求,乃欲在既定的界限(兵学)之内,在精力与篇幅许可的范围之内,尽可能把一切有价值的,一切美好的、引人入胜的精神滋养,奉献给读者。

——读者,朋友,作者之这一主观意向,究竟能否体现于“作品”之中,自然尚须留待读者评判。

虽然如此,亦绝难尽如人愿。任何一部著作,都必然要有其特定的“品位”与“层次”。或者说,由作品自身的内容涵盖及其行

文方式，就大致决定了它的读者层次，就基本上限定了它的“读者群”。曲高和寡，既为“阳春白雪”，就很难兼顾“下里巴人”。论及本书的内容所及：上下几千年，纵横数万里；帝王将相，驰骋其间；伟略奇谋，帷幄运筹；横联儒、兵、道、法，纵贯二十五史。且由引文纷呈，古文色彩甚浓；为求风格之浑然，作者自叙，亦力近简古。——凡此种种，都决定了本书的基本定位，只能在较为“高雅”的学术档次。

然而，细察其具体内容，它又决非拘缩于“象牙之塔”的“学术专著”，更非专攻一隅的“冷门”、“绝学”。秦皇、汉武，家喻户晓；诸葛、韩信，尽人皆知；姜太公，管夷吾，伍员，孙武，文种，范蠡，孙臆，吴起，刘邦，项羽，……唐太宗，宋太祖，朱元璋，成吉思汗，努尔哈赤，康熙，乾隆，林则徐等等，一个个尽为中国历史上光彩夺目的明星人物，就连中学、小学的学生们，也多有耳闻目睹（电视、电影或画册中的）。——若就此而论，则本书之内容所及，又是十分切近于中国之广大人民群众的。故本书虽属于“学术”之列，但决非广大普通读者“望而生畏”的。

准此，我想就更为切近的读者层面，分类“交谈”几句。

其一，“兵”界。

书名《中国兵学》，顾名思义，与其关切最深者，自然是“兵”。

一般说来，时下所称“兵”者，通指“列兵”，或略宽一点，亦含基层军官。至于中高级军官，则多雅称“军人”、“将佐”，下言“军政界”，即指此。“兵”界虽居下层，然而它却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层次，“人民”的主体就是“工农兵”，其数量之大几可居成年人的三分之一。如连“退伍兵”通算在内，或不止于此。旧时代曾有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”之语，时军阀混战，“拉夫”“抓丁”，欺民扰民，甚或杀人放火，无所不为，如不迫于“卖命吃粮”，极少有人

走“当兵”之路。然而，此乃特定之历史时代所致也。即使在过去之时代，亦有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之说。班超“投笔从戎”，弃文习武，霍去病“封狼居胥”，马援“马革裹尸”；立功异域，报效国家，被视为好男儿“得天”之“独厚”。时移世异，在当今之历史时代，当兵、从军，已不单纯是个人之选择，而且也是法定的义务。有识之青年，志在兵戎者，实大有人在。当代之军营，文化素质已成为必备之“门票”，“目不识丁”者已与此绝缘。且军营之中，高科技，现代化，均为时代的要求，兵员在进军高科技的同时，亦必有人文、历史、将帅谋略的要求。古人韩非有言：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西人拿破仑由“列兵”到“统帅”，古人朱元璋由“行童”到皇帝（亦是全军之统帅），此决非仅是其“个人”的“奇迹”，实亦含蕴着历史的规律。记得有人曾言：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，决不会成为好的士兵。此语或有“过甚”之嫌，然而它也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特征。“列兵”之与“统帅”，并没有不可逾越的“鸿沟”。

——“列兵”朋友，如果你已下决心在“兵”的事业中创造未来，并且期望着令人钦敬的成就，《中国兵学》或可助你一臂之力。

其二，“军政”界。

此项所言，是指已在军政部门居于相当职位的“官员”，当然，也包括地位、权力相当显赫的人士。若有意翻阅本书，作者自一如一切愿意阅读本书的“读者”一样，一视同仁。一般说来，既已居于军政要职，其能力、知识、才华，大致是无可怀疑的，本无须作者在此喋喋碎语。然而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既要阅读本书，作为本书的撰著者，我仍想略言一二。就本书内容而言，其所及人物，从帝王将相，到草莽英雄，几乎无所不有。勇力过人者有

之，深谋远虑者有之，才华盖世者有之，正气凛然者有之，称雄一隅者有之，登峰造极者有之，……笔者所录，或失偏颇，然基本史实决无二致。——诸君或多公务缠身，无暇他顾；若备诸案头，偶有翻阅，一般说来，必有可取。虽无“雪中送炭”之功，必有“锦上添花”之效。——不知诸位然否？

其三，“工商企业”界。

“兵学”的本质，实为“统帅”之学。上察天时，下审地利，中御人和，“庙算”于先，兴师于后，其运筹帷幄，调兵遣将，以搏击疆场者，为求克敌致胜也。更有高人一筹者，“上兵伐谋”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能不费一枪一弹而令对手屈服，所谓“兵不血刃”者也。此唯深谋远虑、神机妙算者能之。企业家们，“老板”们，难道您没有“身居帅位”之感吗？商场就是战场，竞争就是斗争。古之范蠡，潜心运谋，兴越灭吴，其军功之显赫，居越之首；及其归隐，浮海北渡，由齐入卫，定居于陶，以谋略运筹而货殖，成为富冠天下的“陶朱公”。时有白圭者，亦兵将出身，转而经商，乃十分自觉地运用孙、吴兵略。如今东国日本，以兵法为高层职员必修之课，实为“商战”形势所迫之必然趋向也。“老板”们大多庶务繁忙，或有“日理万机”之困。唯其如是，更有借助历史经验之必要。既居“主帅”之位，自需“辅臣”“谋士”以相佐助，如汉高之有张良、陈平，朱元璋之有刘伯温、李善长也。本书所及，尽谋略、智慧之渊藪也，开卷即益人智，诸公及其“幕府”，何妨略作探析？

其四，“竞技”界。

竞技，即双方或多方依一定之规则相对抗，相争夺，以竞胜负，以分高低。此乃笼罩于“和平”“友好”形态之下的“特种战争”。故兵略权谋，潜思深图，同样适用于是。齐国田忌赛马，孙臆略施小计，立刻转败为胜；汉高被困平城，陈平图影相赠，其围

不战自解；安禄山反叛大唐，李光弼“野宿”以待，空帐降其大将二员。——斯皆“知彼知己”，“伐谋”致胜者也。竞技各界之有识之士，领队，指导，教练们，何妨借彼之智？《诗》云：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（《小雅·鹤鸣》）；况竞技、对抗、斗争，实皆以类相随也！

其五，文化、演艺界。

这一领域，名人荟萃，多为有一技或多技之长的“明星”人士。其人或“刻意”于自身之专长，而无意他顾，或欲顾而无暇，特别是“历史”、“古籍”。俗云：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而愚者千虑，或有一得。笔者既“陷身”于古籍，故所思所虑，或如司马迁书孟轲之言：“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，迂腐而不适于实用也。——虽然，愿进愚者之一言，诸君可姑妄听之：

其一，无积不厚，无渊难藏。“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”若欲如庄生所称之大鹏，“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，而翱翔于艺术之天空，无渊深厚藏之“文化”气流，则何以载浮？中国之历史文化，浩如烟海，笔者精心编制之《中国兵学》，或可助君以为浮海之舟也。

其二，当今时代相当数量的“明星”，实缘中国历史中固有的政治、军事明星而成名。即君之成名，实借古人之力也。作为“仿制品”（请恕我直言！）何妨更为深入全面地体味一番历史之人生？如有此愿，拙撰《中国兵学》，或可为君做一“导游”罢。

* * * *

据载，东晋左思撰《三都赋》，构思十年，始公之于世，由于其用心精工妙极，致使争相转抄，洛阳纸贵。时至今日，生活节奏之快，已今非昔比。谁人欲再以十年之功，雕琢一“赋”，已属痴人说梦，不可思议。然而，前人精雕细刻的追求，将永远值得今人钦敬、学习。

笔者自知才拙能低，虽思“洛阳纸贵”，然无由自达。纵然如此，作为一种追求目标，笔者却是时时牵挂心怀的。古人云：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笔者以至诚之心，开天真之情，行文循实，析理如事，情随事理，发而弗抑。若使读者能随行文之脉搏而动，笔者即甚知足矣。

最后，愿套用林公则徐诗句以与读者共勉：

力微任重虽神疲，愿竭衰庸勉为支。

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毁誉避趋之！

一九九八年元旦夜

卷首说明

一、本书之定名，取自于中国古代史籍之“兵家”。“兵学”者，即“兵家之学”也。

二、依《汉志》所列，兵家又分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种。“权谋者，以正守国，以奇用兵，先计而后战，兼形势，包阴阴，用技巧者也。”一则“权谋”本来就总统全局，二则时至今日，古代兵法中尚能活跃于政治、军事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之中者，亦唯权谋方略也。故本书“兵学”内容之主体，乃以“兵权谋”为限。其他诸种，惟与主体相关者或可涉及。故其内容定位，与现代军事科学之概念基本无涉。同则同，异则异，各任其便。此乃时移世异也。

三、所谓“兵权谋”者，其内涵之基本来源，就是中国古代的战争经验。其中已为前人所总结、所整理者，即被称之为“兵书”或“兵法”，如《孙》、《吴》、《武经七书》之类也。其中尚未被人系统整理、提炼以形成兵书形态者，即为散见于古代史籍中之战争载录，或纪言，或纪行，此即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及二十五史等典籍中之素材也。——由此，即使本书之内容形成了两条基本线索：其一，以历代兵书为基本资料的兵学理论线索；其二，以史籍所载之活的战争经验之线索。二者形成两条主线，又时有交织糅合，本书则依时序分立章节以叙之。

四、中国兵学理论体系的奠基，为春秋孙武的《孙子兵法》。

兵学之有孙子，即如儒学之有孔子，道家之有老子。正如韩非之言“儒之所至，孔丘也”，同样，“道之所至，老聃也”，“兵之所至，孙武也”。在中国古代这一时限之内，历史已经证明，孙武确是后人无可逾越的兵学“至圣”，没有第二者可与之并立。他精湛地总结了其生存时代之前的全部战争经验，创立了至今仍被后人叹为观止的无与伦比的兵学体系，因此，他当之无愧地被视为时代的核心，亦无可取代地成为了贯串全部中国兵学的轴心。因此，本书自始至终，凡涉及《孙子兵法》之处，必浓墨重彩，情不能抑，理不能止。此亦中国兵学的主体所在也。

《武经七书》，既以《孙子》居首，亦以《孙子》为核心，而其他六书则予以有效地辅翼，故《武经七书》即成为“典籍”一线的事实上的主体。

五，鉴于本书的基本定位，故于“战争经验”一线，亦着眼于“大局”，着眼于全局性韬略。立足于此，故“政治”不能不居于首要地位，军事的本质，军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均在于政治，此乃历史的规律。刘邦之胜项羽，光武之灭王莽，朱元璋之所以削平群雄，均在于斯；而李自成、张献忠之所以失败，亦在于斯。故每于“民心”向背之场景，笔者必大书特书而后已，情不能抑也，理不可止也。既于书中谆谆喋喋，不厌其烦，复于卷首大字以明之。“天”之所与，即“民”之所与，至理也，不可泯灭也。

立足于此，故书末于林公则徐立两章以叙之，也许有人并不视之为“兵家”。同样立足于此，如三国名将甚至被称为“武圣”之关羽者，笔者曾反复衡量，委实无可立节（更谈不上“章”）以叙及。“丈八长矛”、“青龙偃月刀”之类，实在入不了本书的正题。（如关羽，当然只能以《三国志》为据，余不可信也。）——此或可大致显示本书于“战争经验”一线的收录原则罢。